

对于政治腐败的成本效益分析^{*}

蔡 利

(厦门大学 计划统计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政治腐败以其巨大的危害性而受到社会的关注。从一个经济学的角度, 对政治腐败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宏观和微观的分析, 并以此出发, 试图对反腐败应达致的均衡水平和应采取的措施进行较为系统的思考。

关键词: 政治腐败; 成本; 效益; 反腐败

中图分类号: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585(2003)02-0106-05

An Analysis of Cost and Efficiency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CAI Li

(Planning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of China, the society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harmfulness of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In view of economy,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cost and efficiency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gives a reflection of the level of average equilibrium against corruption and the measures to be adopted.

Key Words: Political Corruption; Cost; Efficiency; Against Corruption

腐败现象的产生与人们的求利动机密不可分。但这里有一个如何进行成本—效益的平衡问题。在正常情况下, 人们总是会选择收益高于成本的行为, 而不是相反。笔者试将这一成本选择定律运用到具体的政治腐败行为分析中。

一、政治腐败的宏观成本分析

从宏观角度来考虑, 需要建立模型对政治腐败的成本所体现的行为关系做一分析, 笔者将这些关系分为4类: (1)腐败数量和腐败成本之间的关系; (2)腐败数量与量刑之间的关系; (3)腐败、逮捕与定罪数量和司法部门的公共支出之间的关系; (4)定罪数量和监禁或其他形式惩罚的成本之间的关系。

1. 损害。政治腐败之所以为社会所不齿, 是因为腐败分子以牺牲社会公共利益为代价, 来换取个人的私利。损害的数量随腐败活动水平的上升而增加, 如下式所示:

$$H_i = H(O_i), \text{ 且 } H'_i = \frac{dH_i}{dO_i} > 0 \quad (1)$$

这里, H_i 表示第 i 种活动造成的损害, O_i 表示活动水平。腐败分子所得到的社会价值一般也会随犯罪数量而增加, 如: $G = G(O)$, 且 $G' = \frac{dG}{dO} > 0$ (2)

社会的净成本或净损害即是损害与收益之间的差额, 可以写作:

* 收稿日期: 2002-12-16

作者简介: 蔡利(1977—), 男, 福建晋江人, 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投资经济理论。

$$D(O) = H(O) - G(O) \quad (3)$$

因为违法收益最终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 而增加的腐败行为会造成边际损害递增, 由此, $G'' < 0$, $H'' > 0$, 因此: $D'' = H'' - G'' > 0$ (4)

由于 H' 和 G' 均大于 0, 所以 D' 的符号取决于它们的相对大小, 然而, 由 (4) 可以得到, 对于所有的 $O > O_a$, 若 $D'(O_a) \geq 0$, 则 $D'(O) > 0$ (5)

2. 逮捕和定罪成本。用于公检法及其设备的支出越多, 侦破和定罪就越容易, 由此, 可以推断公检法活动的产出和人力、物力、财力的各种投入之间的关系, 形如 $A = f(m, r, c)$, 这里, f 是表示“当前工艺水平”的生产函数。如果 f 和投入要素的价格一定, 那么, “活动”的增加带来支出的更多增加, 用下式表示: $C = C(A)$ 和 $C' = \frac{dC}{dA} > 0$ (6)

公检法部门的办案、诉讼费用越低, 由先进技术和设备决定的当前工艺水平的提高, 就使得达到某一特定活动水平的支出越少。

衡量活动的实用的近似方法是判定有罪的数量, 可以写作: $A \approx pO$ (7)

这里, p 为判定有罪的数量与所有政治腐败行为的数量之比, 表示判定有罪的总体可能性, 将 (7) 式代入 (6) 式, 微分得到:

$$C_p = \frac{\partial C(pO)}{\partial p} = C' O > 0 \quad \text{及} \quad C_o = C' p > 0 \quad (8)$$

条件是 $pO \neq 0$ 。定罪可能性的提高或腐败数量的上升会使总成本增加, 如果增加的“活动”的边际成本上升, 那么深一层的含义在于 $C_{pp} = C'' O^2 > 0$, $C_{oo} = C'' p^2 > 0$, 但更为复杂和实际的方法不是用 (7) 式中的含义, 即只用定罪衡量“活动”, 或者 p 与 O 有同一弹性, 而是引入更为一般的关系式:

$$A = h(p, O, a) \quad (9)$$

变量 a 表示逮捕和“活动”的其他决定因素, 而不去假定 h 对 p 的弹性等于 h 对 O 的弹性。通过代入, 有成本函数 $C = C(p, O, a)$ 。在极大多数情况下, h 对 p 、 O 、 a 的一阶导数均大于 0, 那么显然, C_p 、 C_o 、 C_a 均大于 0。

为了确保最优位置不落在隅角, 有必要对成本函数的二阶导数限定某些条件, 结合其他一些假定, 充分条件是: $C_{pp} \geq 0$ 、 $C_{oo} \geq 0$ 及 $C_{po} \geq 0$ (10)

3. 腐败的供给。这一部分的分析将涉及腐败行为微观成本效益分析的部分内容。腐败行为的产生同定罪可能性、判定有罪后的惩罚、同从事合法与其他非法活动可得到的收入、逃避逮捕的机会、违法意愿等其他变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可用函数表示如下: $O_j = O_j(p_j, f_j, u_j)$ (11)

这里, O_j 表示特定时期的违法数量, p_j 表示每桩腐败的定罪可能性, f_j 表示每桩腐败犯罪的惩罚, u_j 表示所有其他影响的混成变量。

因为只有判定有罪, 腐败者才会受到惩罚, 所以实际存在一种“价格的差别待遇”和不确定性: 如果判定有罪, 那么他将因此为每桩犯罪支付 f_j , 否则毫发无伤。而 p_j 或 f_j 的任何增加都会减少腐败行为的预期效用, 因而减少其违法数量。即: $O_{pj} = \frac{\partial O_j}{\partial p_j} < 0$, $O_{fj} = \frac{\partial O_j}{\partial f_j} < 0$ (12)

而一般的认识是, 定罪可能性比罪行惩罚更有威慑力, 这意味着, 至少在惩罚的相关范围内, 腐败分子对风险持偏重态度。

违法总量是所有 O_j 之和, 该总量依赖于 p_j 、 f_j 、 u_j 的集合。我们考虑它们的平均取值: p 、 f 和 u , 将腐败的市场函数写作: $O = O(p, f, u)$ (13)

假定该函数的性质与个人函数的性质相同, 特别是, 该函数同 p 与 f 负相关。当腐败分子对风险持偏重态度时, 该函数对 p 的反应比对 f 的反应更为敏感。实际上, 公共政策就是通过出现在出现风险偏重的范围内, 也就是“违法不合算”的范围内选取 p 和 f , 从而是社会损失减至最小。

4. 惩罚。各种惩罚的成本可以同它们的货币等价物或价值相对照, 当然可以用罚款直接衡量。如监禁成本是腐败分子放弃的收入同消费与自由的限制的价值的贴现值之和, 但由于放弃的收入和

监禁限制的价值因人而异,所以一定时期的监禁判决成本也不相同。惩罚不仅影响着这些腐败分子,也影响着社会其他成员。在不计征收费用的情况下,腐败分子支付的罚款能够为社会所利用。但绝大多数的惩罚既有损这些违法者,也有损其他社会成员,例如监禁就需要政府支付警卫、监管人员、建筑、食物等方面的费用,而这部分费用来自于税收。

惩罚的社会总成本是腐败分子的成本加上别人的成本或减去其他成员的所得。罚款除了征收费用外等于其他成员的所得,因而作为一种转移支付,罚款的社会成本约等于0。而缓刑、监禁及其他惩罚的社会成本通常超过了腐败分子的成本。把社会成本根据腐败分子的成本写作: $f' \equiv bf$ (14)

这里, f' 表示社会成本, b 表示从 f 到 f' 的转换系数。就罚款而言, $b \approx 0$,就审问、缓刑、假释、监禁及其他绝大多数惩罚而言, $b > 1$ 。

5. 社会损失函数模型的建立。

我们假定社会具有一个能够衡量腐败造成的社会损失的函数: $L = L(D, C, bf, O)$ (15)

并假定: $\frac{\partial L}{\partial D} > 0, \frac{\partial L}{\partial C} > 0, \frac{\partial L}{\partial bf} > 0$ (16)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 f 、 C 或者 b 的取值使 L 达至最小。将损失函数表示为腐败行为、定罪及惩罚造成的实际收入的总损失,如:

$$L = D(O) + C(p, O) + bpfO \quad (17)$$

$bpfO$ 表示实行惩罚的社会总损失。在此式中,社会能直接控制的变量是对付腐败的支出费用 C 、对判定有罪的每桩腐败行为的惩罚 f 以及用 b 表示的惩罚形式。

为了便于分析,将 p 而非 C 视为决策变量,而且系数 b 也被视为大于0的已知常数,因此, p 和 f 是仅有的决策变量,为取得最优值需要对 L 求导,以得到两个一阶的最优条件:

$$\frac{\partial L}{\partial f} = D'O_f + C'O_f + bpfO_f + bpO = 0 \quad (18)$$

$$\text{和: } \frac{\partial L}{\partial p} = D'O_p + C'O_p + C_p + bpfO_p + bpO = 0 \quad (19)$$

当 O_f 和 O_p 不为0时,用 O_f 、 O_p 约简,可得:

$$D' + C' = -bpf(1 - \frac{1}{\epsilon_f}) \quad (20)$$

$$D' + C' + C_p \frac{1}{O_p} = -bpf(1 - \frac{1}{\epsilon_p}) \quad (21)$$

$$\text{这里, } \epsilon_f = -\frac{f}{O} O_f \text{ 和 } \epsilon_p = -\frac{p}{O} O_p \quad (22)$$

两个等式的左边表示增加腐败行为数量 O 的边际成本:(20)式中由 f 的减少形成腐败数量的增加,(21)式由 p 的减少形成 O 的增加,因为 $C' > 0$ 且假定 O 在 $D' > 0$ 的范围内,所以通过 f 增加 O 的边际成本必定为正。 p 的减少会部分减少对付腐败的成本,所以,当 p 减少时增加 O 的边际成本必定少于当 f 减少时增加 O 的边际成本;当 C_p 充分大时前者甚至可以取负值。由 $-bpf$ 给定的平均“收益”为负,但由(20)式和(21)式右边给定的边际收益不必然为负,因为如果弹性 ϵ_p 和 ϵ_f 小于1,则该边际收益为正。而且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损失最小。

因为通过 p 的改变而改变的 O 的边际成本小于通过 f 而改变的 O 的边际成本,所以, P 的均衡的边际收益也必定小于 f 的均衡边际收益。但(20)式和(21)式表明,当且仅当 $\epsilon_p > \epsilon_f$ 时, p 的边际收益的取值可以更小。这正是表明腐败分子对风险持偏重态度因而“违法不合算”的条件。由此,如果 p 和 f 的取值在违法者总体说来对风险持偏重态度的范围内,那么,腐败的损失可以减至最小。虽然只有腐败者的风险态度能够直接决定“违法合算”与否,但理性的公共政策通过 p 和 f 的取值间接地为“违法不合算”提供了保证。

二、政治腐败的微观成本效益分析

1. 个人腐败的成本分析。

一般个人犯罪行为成本可以用公式表示： $C=(L+E+S+H)P$

C ：犯罪成本； L ：法律惩处； E ：经济惩处； S ：社会惩处； H ：良心惩处； P ：定罪概率。 L 、 E 、 S 、 H 四者的和其实就是宏观分析中的 f 。

从此公式出发，我们知道，腐败者在进行腐败活动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是诸多方面综合的、总体上的代价和风险。具体包括：(1)事前投入的经济成本，如贿金、物资等；(2)事前投入的权力资源成本，如权钱交易中权力资源的介入等；(3)事前、事中投入的自我精神折磨、谴责等；(4)事后的因达到违法犯罪被判刑而丧失的人身自由，甚至是丧失生命的损失；(5)因违反党纪政纪而受到的各种处分；(6)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7)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可能的政治晋升机会；(8)因腐败行为而被课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带来的经济损失；(9)舆论谴责、人际关系恶化、人格失落等精神和道德上的损失；(10)因腐败行为而导致的下属的政治支持、忠诚的减弱甚至丧失。

2. 个人腐败的收益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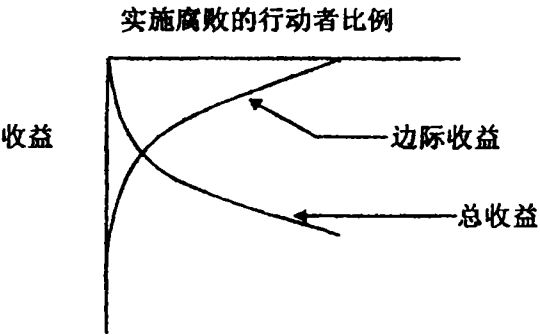
实施腐败行为的收益有：(1)物质形态的“超经济暴利”；(2)信息或机会的优先性，如政治晋升的机会等；(3)在向上和向外方面，加强自身与组织或组织其它成员的整合程度；(4)在向下方面，由腐败引起的一部分下属对自己的倾向性政治支持和忠诚；(5)由于腐败而带来的周围环境所施加政治、道德压力的降低；(6)腐败还可以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僵化的政治、法律体制的束缚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于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效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腐败行为呈现出“高收益、低风险”趋势。同时，至少在目前，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的伸缩性是相当巨大的，因为这些风险成本要变为现实的腐败成本，其关键在于腐败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和被惩罚的可能大小及其严厉性，而这种可能性和严厉性在目前要大打折扣。所以，如果一个拥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比从事遵纪守法还要多的纯收益，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某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的公仆就很容易堕落成为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可以用下列博弈矩阵来表示：

		行动者 B	
		廉洁	腐败
行动者 A	廉洁	1, 1	-1, 2
	腐败	2, -1	3, 3

在此矩阵中，若行动者 A 、 B 两人都保持廉洁，他们的所得皆为 1，但当其中一人转而成为腐败分子，则他的所得增加到 2，而廉洁者的所得会因腐败者的寻租行为而受到损害，甚至廉洁者本身也会受到打击报复。但如果两人勾结起来，共同实施腐败行为，协同效应会使两人的收益都增加，并达到一个纳什均衡(3, 3)。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向畸形方向发展。见右图。图中的收益取负值，这表示每个行动者都把尽量缩小损失当做最大收益。图中还显示了边际收益，它同样取负值，因为实施腐败的行动者在所有行动者中的比例上升时，边际收益呈下降趋势。由于在无论何种情况下，腐败者的比例增加，都会使廉洁者的损失加大，因此，在上述比例尚未显著增加以前，不愿蒙受损失的行为者应当实施腐败行为。而个人损失的减少，甚至于收益的增加，都是以社会的总成本的扩大为代价的。



三、如何进行制度安排来降低腐败行为的产生

根据上述两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宏观角度讲,要使由于 f 、 p 的减少形成社会边际成本的增加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减少达到均衡,即使腐败数量的产生达到最优。而从微观角度讲,只有使个人腐败行为的成本最大化,并且使腐败成本变“隐性”为“显性”,使之成为腐败者必须承担的个人成本时,才能有效地降低腐败行为的产生。这两个目标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要使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达到统一,并且结合我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的国情,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

1. 提高因腐败而定罪的概率 p 。因为多数人对风险持偏重态度,所以提高定罪概率 p ,能起到较好的威慑作用,制止腐败行为的产生。但是正如前文所述,提高定罪概率的同时,也会造成社会损失的增加,而且定罪概率一旦超过均衡的状态,制止犯罪的行为反而呈现明显的外部不经济性,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减少。如此一来,提高定罪概率就成了一把双刃剑。而且仅仅靠威慑来达致目标,也往往是治标不治本。

2. 提高腐败行为的私人成本 f ,使其大于收益期望。这主要通过立法规定从重处罚腐败行为,党纪、行政、刑事和经济处罚四管齐下,即通过提高 f ,从而间接地提高个人腐败成本来实现。国家一方面应进一步规范腐败案件的量刑,提高法律成本,这不仅涉及到公平性的问题,也可以给腐败分子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使他们不会产生侥幸心理。另一方面应尽快对现行法律涉及行贿者和受贿者的经济惩罚作更明确的规定,大幅度提高双方经济成本,使之成为腐败交易付出高额的经济代价。但要满足一个条件,即履行惩罚措施付出的代价要小于规范为其带来的利益。

3. 深化体制改革,完善改革措施。特定形式的政治腐败往往会随着某一领域体制改革的启动而发生发展,而随着该领域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新体制的日益完善又会逐渐消退。

4. 打破垄断,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通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辖范围,确定合理的管制边界,改革或优化政府的经济管制和管理方式,把更多的事交给市场去完成。

5. 建立事前监督机制,即预防犯罪机制,提高监管约束的水平。这就需要提高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并且要完善机构监督,强化社会监督。

6. 破除“腐败保护主义”。腐败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某些地区或部门的领导干部采取种种手段阻挠腐败案件的查处工作,保护乃至提拔重用因涉足腐败而被查处的干部,但如果腐败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查处,就会有更多的人效法腐败分子从事腐败活动。

7. 确保经济人利益,适当激励,如采取裁员加薪的办法,使公务员不必冒险参与腐败活动。

8. 加强操守教育。这首先要加强国家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的教育,加强法律、规章、职守、道德、义务、良心、荣誉和幸福观的教育。

参考文献:

- [1] (美)加里·S·贝克尔著,王业宇,陈琪译.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3. 55—104.
- [2] 沈远新. 变革时期腐败持续不止的成本效益分析[J]. 百年, 2000, (1).
- [3] 王春雷,章仁俊.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J]. 商业研究, 2001, (5).
- [4] 张维迎.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14—22.
- [5] (美)Jonathan H. Turner 著,邱泽奇等译. 社会理论的结构学[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李品秀